

红一军团攻占樟树

卢汉兴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在汀州发布《由闽西出发向广昌集中的命令》，提出要“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接着，部队离开汀州开往广昌集中，逐步向南昌推进。七月十一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在兴国发出“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经永丰来到新干麦斜，二十二日在麦斜发布“攻击樟树的命令”。

七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由新干来到清江，在永太部署了攻打樟树镇的战斗。红四军分二路向樟树推进。一纵队从侧翼沿山脚下由新干的甘泉，经清江的双溪、洋湖、店上、晏公堤、茅垓里、吴家巷；二纵队打正面兵分二支，一支沿赣河堤小路，由永太经洋塘、孔埠、溪东、横梁、武林、鳌州，另一支沿粤赣公路，由永太经石岗、南山、垓里、茅垓里、古圳上、中郭，分别进攻樟树。三纵队为预备队。红十二军担任打迂回牵制敌人的任务，他们从新干朱山里绕清江店下一带到樟树。

正当红军向樟树推进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派第十八师王捷

俊旅（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妄图阻止红军前进。

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与敌军战斗在樟树镇附近的狗颈桥、长生庵、马洲上一带。红军以我众敌寡之优势，采取包围战术，“击破二营之敌，缴枪近二百，俘虏散兵一百余”。敌军大败，溃逃南昌。红军分别从东门、马洲上、长生庵三路胜利进驻樟树镇。

红军进城后，军纪严明，商店照常营业。他们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先后在天后宫、晒谷场、柑子园、三皇宫、化眉庵、东门、雷家巷等处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形势及党和红军的政策，散发传单，并将打土豪的财物散发给贫苦人民。红军在樟树打了土豪十三户，筹款六万元（银元），还扩了军。群众积极支援红军，铁工为红军打红缨枪，裁缝为红军赶制军服。

毛泽东同志来到樟树后，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淦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环水，于势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改变直接进攻南昌的计划，决定部队在樟树乘虚西渡赣江。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红一军团总部在樟树镇发布“占领樟树后渡河的命令”，对红军渡河一切事宜作了具体的布置。四军二纵队于午后三时先行渡河，在赣江北岸警戒，赣

江南岸归三军警戒，架设机关枪掩护河面，以防敌人汽船来扰。

正当红军在樟树西渡赣江的时候，由吉安方向顺赣江而下驶来一艘“美洲号”轮船，向渡江的红军进行骚扰。警卫在江岸的红军战士命令轮船靠岸，该船还是顺江逃窜。于是，红军夹江开枪射击，继又乘渡船包围，结果，敌轮被我军打破，“缴了步枪四十二支，打伤敌数名”。红军按四军、总部及直属队、十二军、三军之次序，于七月二十六日晨全部渡过了赣江，在朱家渡、杨家埭、经楼圩一带宿营后即向高安挺进。

红一军团这次进攻樟树，打得敌人遗逃，大大提高了红军士气，在江西震动很大，也给南昌以严重威胁。同时，获得了大量物资，补充了军饷。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千年古镇响惊雷

——记陈毅同志在临江的革命活动

肖鼎盛 付玉纯 口述

熊文龙 整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同志在戎马倥偬和工作繁忙之际，于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夏，来到古镇临江，领导我县人民开展革命活动，作出了令人难忘的历史贡献。

建立中国国民党清江县党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陈毅同志从南昌来到临江。他先在镇内转了一圈，然后走到亭子口“隆兴”酒店，机警地向四周环视一下，柜台内只有一人在拨弄算盘。陈毅同志问：“你是店老板吗？”

“我是帐房，老板在后堂。”那个拨算盘的人说。

这时，店老板陈竞兴正好从后堂出来。帐房告诉陈毅同志：“这位就是陈老板。”

“陈老板，宝号有什么好酒？”陈毅同志问。

“敝店只有提原，大曲和冬酒。”陈竞兴答。

“我想买点状元红。”陈毅同志说。

陈竞兴打量一下陈毅同志，见他西装笔挺，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心里已经明白了。因为前不久，陈竞兴的三弟陈道兴从省城写来密信，告知陈毅同志将到临江开展工作，联络暗号是“状元红”。于是他问：“先生，你要状元红？”

陈毅同志：“别号？”

陈竞兴：“枪平！”（“枪平”是当时清江县党组织的代号，陈竞兴是党组织的联络员。）

陈毅同志从内衣掏出一封介绍信给陈竞兴。陈竞兴看后连忙说：“陈将军，一路辛苦了！”陈竞兴把陈毅同志引到后堂，稍事休息，便一同到县党部筹备处（该机构设在中山公园原府衙内）。到了县党部筹备处，主任肖椿年热情接待了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告诉肖椿年，他这次受命前来清江，主要是协助建立中国国民党清江县党部，并开展工农运动。

当天晚上，县党部筹备处的全体委员，聚集于座落在南门的县立第一小学开会（肖椿年兼清江县教育局局长及县立第一小学校长），研究了成立县党部的有关具体事项。

在这之前，即一九二六年初秋，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指国民党）李富春同志，率军从湖南进军江西，来到临江，通过秘书徐炳嵩（清江人，肖椿年之学生）的联络，认识了肖椿年，并几经协商，任命肖椿年担任中国国民党清江县党部筹备处主任，还经肖椿年推荐，任命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英语教师徐孟熊为代理清江县长。经过二个月的准备，

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并向省作了汇报，所以，上级派陈毅同志来清江指导工作。

陈毅同志到临江后，立即进行社会调查，掌握敌我及各阶层的情况，并亲自培养吸收了易柏青、彭存艺、肖伟民等三十多人入党。经过充分的酝酿，召开了第一次县党代会，顺利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清江县党部。选举结果：县党部委员长肖椿年、常委兼组织部长董礼昌（中共地下党员）、常委兼宣传部长肖立年、常委兼工农部长和县总工会委员长余家隐（中共地下党员）、常委兼县农民协会会长彭存艺、常委兼秘书长易柏青、常委兼妇运会会长丑泽兰、常委兼公安局长肖伟民、常委孔仲玉（中共地下党员、董礼昌的母亲、临江女子小学教师）。除选出以上九名常委外，还选举陈竞兴为县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邓世安为委员兼青年部长、刘子英为委员兼县总工会秘书、周江为委员兼县农民协会秘书。

从此，新诞生的清江县党部和清江县国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工农运动，为支援北伐战争、打倒反动军阀，作了一定的贡献。

庆胜利 闹元宵

由于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国民革命军的浴血奋战，广大民众的有力支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反动势力土崩瓦解。转眼间，一九二七年春节来到了。为了庆胜利、迎新年，陈毅同志指出：在春节期间大搞庆祝活动，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武

装劳苦大众的思想，引导他们积极地投身伟大的革命洪流。

县党部宣传部长肖立年亲自负责，组织和领导这场规模较大的文艺活动。正月初五、六，几十条龙灯汇集县城临江镇，昂首翘尾，与烟花和鞭炮相互辉映；还有众多的采龙船，千姿百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

到了元宵之夜，庆祝和文艺活动形成了高潮。街头巷尾，吹唢呐、打锣鼓、踩高脚，热闹非凡。万寿宫内，则正在公演一出《聂余小士》的文明戏。该剧的内容是揭露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唤起劳动人民向反动势力进行不屈的斗争。由于作了精心的排练，所以轰动一时，场内爆满。参加演出的人员有党政工作人员、县立第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以及革命青年等三十多人。

这天晚上，陈毅同志和其他党政机关的领导人都坐在台上观看。当剧情发展到大土豪聂余小士（县农民协会会长彭存艺饰）正躺在床上抽大烟时，两个被土豪收买的流氓突然向彭存艺投掷石块。经过一阵短时的骚动，这两个歹徒当即被县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抓获，并送往县监狱。这时，广大观众高呼革命口号。陈毅同志风趣地说：“你们看，现在群众觉悟提高了，那怕土豪劣绅来捣乱！谁想阻挡革命潮流前进，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大张旗鼓 开展打土豪斗争

清江县党部成立后，县工会、县农会以及妇女、青年等

组织也都相继成立。县里较大的圩镇如樟树、永太、店下、经楼、太平、黄岗等，先后成立了工会组织，各区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会员达五、六万人。陈毅同志指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必须不失时机地组织他们开展打土豪斗争。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广大农民，多么渴望起来革命。在工会、农会的领导下，他们惩办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破除封建迷信。

这场打土豪斗争，在一九二七年清明节前后形成了高潮，声势浩大，迅猛异常。

打土豪的方式，一是戴高帽游街（农村则是游乡）。游街（或游乡）的时候，一些农会会员举着红旗，打着铜锣在前边开道，土豪走在中间，后面许多群众或扛着梭标（在县城，工人纠察队则扛着三、四十条长枪），或擎着小小的三角红旗，跟着农会干部高喊口号。二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全部或一部分），分给贫民。三是责令他们减租减息，不许压迫和剥削劳苦大众。不论城镇农村，到处张贴革命标语，教唱打土豪歌谣。

临江镇的打土豪斗争，开展得更为激烈。县党部主要领导亲自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农部长（兼县总工会委员长）余家隐，几乎每次都出现在游斗土豪的队伍中。有一次游斗一个姓郭的土豪，余家隐骑在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上。当队伍走到县立第一小学时，该校教师刘子英（县总工会秘书）当即宣布停课，组织学生上街观看并呼喊口号。余家隐见一个二年级学生肖某某个子矮，被人群挡住视线，赶

快跳下马来，把他抱上坐骑尽情观看，乐得这位小学生吞不上咀。

打土豪斗争，大概持续了二十多天。农民运动的狂飙，席卷肖江和赣水两岸，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那些土豪劣绅们昔日的威风，再也看不见了。

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半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陈毅同志虽因担任要职，军务和政务繁忙，几度回省城或赶赴外地。但在临江，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检阅革命运动的成果，显示工农运动的磅礴气势，陈毅同志建议在一九二七年端午节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决定在端午节举行“清江县农民游行示威大会”。

事先，县农民协会作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并向各乡农民协会进行了具体的布置。

端午节这天，晴空万里。早上七点钟，各乡农民代表依次进入会场（边远地区的代表头一天到达）。大会会场设在临江镇万寿宫。主席台设在万寿宫的戏台上。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陈毅同志、肖椿年委员长以及县党部常委和各部门的负责人。会场内只能容纳代表一千多人，其余的代表都按指定地点站在会场附近的空地和街道上。八点整，大会正式举行。这次大会由县农民协会会长彭存艺主持，陈毅同志作了报告，肖椿年委员长也讲了话。接着，农民代表分别讲话。大

会气氛热烈，会场内外不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

大会结束后，进行了群众示威游行。参加游行，每人手持红缨枪，一路高呼口号。游行的具体路线是：万寿宫（会场）——府门口——糠街——柴米街——井仔头——亭子口——十字街——西大街——西门（登上城墙）——南门——文明门——清波门——万胜门——东门——北门——富胜门——最后回到西门（下城墙）。此时，游行示威方告完毕。整个活动历时四小时，到中午十二时才结束。

当时正值盛夏，气温较高。为了保证这次万人游行示威大会的顺利进行，县农民协会事先通知有关部门，在沿途设立了三十多个茶水招待站。有的市民，还自动在家门前设了茶水站；有的药铺，还配了防暑药品，免费供应游行群众。

这天上午，临江城内外，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口号震天，这座千年古城简直沸腾起来了。

陈毅同志总结这次大会时指出，人民，只要我们唤起人民、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就可以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端午节刚过，窃踞武汉国民政府要职的汪精卫，与蒋介石互相勾结，阴谋叛变革命，策划“清党”（即排斥、打击、杀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了应变，陈毅同志奉命离开临江，去迎接更为艰巨的革命任务。

英明昭日月 热血洒竹溪

——共产党员聂之俊烈士生平简介

杨荣宗 整理

(一)

一九三九年元月二十二日傍晚，在鄂北竹溪县泉溪壑壑的密林深处，一声枪响之后，一位革命者捂住冒血的胸膛，怒目眦视国民党刽子手，高呼“共产党万岁！”。随着刽子手的第二次枪声，这位革命者踉跄几步，倒在血泊之中，为革命、为抗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就是共产党员聂之俊烈士。

聂之俊，字德明，笔名焉之、云隼，一九一六年谷雨日出生在江西省清江县城上村（今大桥乡城上村）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父亲聂宗尹先生，自办私塾。之俊天资聪颖，自幼随父在私塾习书法、练珠算、诵经书，打下了相当扎实的文化基础。

一九二八年聂之俊考入江西省立第九中学（即今樟树中学）。他当年的老师饶惠元先生（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对聂之俊的聪慧勤奋极为赞许，说：“聂之俊性敏好学，思想进步，是当时班上的高材生。”

一九三〇年秋，聂之俊转至南昌省立一中读初三，并于次年以优异成绩升入高中。一九三三年春转入当时在江西享有盛誉的心远中学读理科班。在心远期间，他潜心学习。据聂之俊当年心远的同学赵隆襄（今北京大学英语教授）、周树人（今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名誉系主任、副教授）回忆，聂之俊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读高三时在全校学科竞赛中，曾获得高三组“总平均成绩最优秀者”和“学科竞赛优胜”的奖赏。他还经常投稿，发表在《心远月刊》上的第一篇论著《分子量的求法》就占了十六开本刊物的三页版面。他的英文水平很高，曾发表过行文流利、叙述通畅的《The two poor brothers》和《An Arachof manacloson》等英文习作。由于聂之俊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时，他同时考取了南京、交通、武汉等三所名牌大学。之俊选择了国立武汉大学电机系。

中学时期的聂之俊就疾恨旧社会的黑暗。一九二八年，十一岁的聂之俊考入江西省立九中。伪校长陈宪章是个贪污腐化、反动透顶的家伙。第二年，学校教职工揭露陈的贪赃枉法行为。聂之俊与何喜林（现在清江博物馆）、熊惠民（书画家，在台湾任教授）作为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聂之俊是年龄最小的代表，和其他代表一道背着行李，步行一百八十华里到南昌，向省教育厅呈递控告陈宪章的联名信。由于参加反陈斗争，他被迫停学。一九三〇年秋，聂之俊转至南昌一中就读，三二年又参加反对伪省主席、国民党政学系头目熊式辉的活动，遭学校当局迫害而转入心远中学。

心远是私立学校，反动势力比较薄弱，有不少革命的、进步的教师任教。聂之俊在心远从雷伯雄、漆裕元等老师处，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初步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熏陶，更加关心国家民族大事。他常在《心远月刊》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表达对黑暗社会的憎恶和对富国强民的渴望。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侵略我国东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我革命根据地。这时，白色恐怖笼罩南昌。聂之俊正读高三，面临毕业，但他没有埋头读书，而是极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封锁消息，国内中文报纸上读不到反动当局卖国投降的消息。聂之俊就和周树人等同学阅读大量刊登路透社、美联社甚至塔斯社电讯的英文《字林西报》，从而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要进一步控制华北，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秘密谈判（亦即后来签订“何梅协定”的谈判）的消息，激起了聂之俊和同学们的极大愤慨。他们把电讯译成中文，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校园内，告诉全体同学。以后，他们经常从英文电讯中译出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消息，油印散发。后学校的外文报纸又被查禁，他们就到省图书馆去抄译，让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的丑恶暴露于世。

一九三五年秋，聂之俊怀着振兴工业的宏愿进入武汉大学电机系学习。当时民族危机严重，日寇侵占东北后进逼平津，华北危急，全国危急，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我党发出《八一宣言》，抗日救亡烽火燃遍全国。聂之俊在武

大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武汉后，聂之俊积极声援北平学生。他同高年级学生一起转抄北平来信、传单、标话口号，并针对特务对学生运动的破坏，在革命标语上挂上一把尖刀，叫做“杀奸刀”，使特务、学奸心惊胆战，罪恶行径有所收敛。

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武汉大学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聂之俊走出课堂，投身斗争，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经受了革命锻炼，成了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坚。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投降主义政策，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北平陷落，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寇铁蹄逼向华中，武汉告急。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聂之俊同志义愤填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的号召，决心投入抗日洪流。当时聂之俊家中父母年老、妻子怀孕在身，老父又曾写信促其返里照应。但是，面对敌寇侵袭、河山沦丧，他毅然握笔给父母妻子写信说：“家里父母的疼爱，夫妻的恩爱，一切家庭融泄之乐，都足以使我每秒钟想回到家的！但是，爸爸、妈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固然有道理，可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每个国民应有的认识，尤其是抗日战争到了这个时期，国难已经再严重也没有了，青年人还能犹豫偷安吗？”男儿报国之志洋溢于字里行

间。他给妻子玉容的信中写道：“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省又一省的地方被敌人占去（不久江西即有成为战区的可能），中国人民被人屠杀，财产被敌人掠夺，妇女被敌人强奸，当全国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整个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底时候，每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没有不投笔从戎，枕戈待旦的！那末，个人的一切，如学业、官禄、家庭，也将成为次要的东西了。”他把对妻子的爱、儿女的私情转化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聂之俊并请老父从国文课本里找出林烈士的绝笔书（注：“林烈士绝笔书”即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烈士在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七日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前夕，写给妻子的一封绝笔书）给玉容看，说：“那多少代表了我此时的意思。”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挽救民族危亡的赤诚之心和对父母、妻子的挚爱，反映了他把对亲人之爱和对祖国之爱统一起来，在国难当头救国家于危亡而割舍亲人之爱的崇高精神。

就是怀着这种精神，聂之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武汉大学，由地下党介绍到湖北应城汤池，参加陶铸同志主持的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是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对国民党内进步人士李范一先生和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琰作了团结抗日的争取工作后举办的。它名为合作事业训练班，实为我党利用合法名义培养抗日游击战争骨干和壮大抗日力量的重要基地。党派陶铸同志以共产党代表的公开身分领导训练班的工作。在训练班里，聂之俊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群众工

作方针方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办合作社的专业知识，极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多次表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以后又在刘顺元同志（今中顾委委员）的党课教育下，聂之俊的爱国热情升华成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信念，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聂之俊由党指派到武汉学习十余天，上级党为他接好了组织关系，中旬即由他率队到鄂西北竹溪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党的地下活动。

（三）

竹溪县地处湖北、陕西、四川等省的接壤处，是湖北省的偏僻边远山区县。那里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但它又是一个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曾是全省建立县委的四个县中的一个，党点燃的革命烈火一直燃烧不断。然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遭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严重。聂之俊同志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属第五战区的竹溪这个偏僻、闭塞、贫困、白色恐怖严重而革命又十分需要的山区工作。

行前，组织上安排了时间让同志们回家做好各种准备。聂之俊却不回家，主动留在武昌收集竹溪方面的材料，进行赴竹溪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聂之俊去竹溪，公开身份是“湖北省政府建设厅竹溪农贷合作指导室主任指导员”。他率领王述宏（女）、赵绿吟

(女)、雷伯衡、李传弢等四人爬山涉水，翻岭越沟，吃苦耐劳，并战胜了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和土匪袭击，历时半个月，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抵达竹溪县。

当时竹溪县伪县长陈世航是个军统特务，反革命嗅觉较灵，尽管聂之俊五人具有合法身份，仍千方百计加以排斥。首先将合作指导室的办公处设在县府右侧广场边缘，四周瓦砾成堆、杂草丛生地方的一间统房内，恶意地将男女五人安排在一室内，白天办公、晚上则搭铺作寝室。夜深人静时，陈世航则派人轮流从窗户中偷看、监视，妄图加以“不轨”的罪名。面对敌人的阴谋，聂之俊和同志们镇定自若，光明磊落，冷静分析形势，展开了抗排斥的斗争。他们因陋就简安顿下来，决定要争取青年学生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他们在合作指导室大门墙上先挂起一幅红标语，上面剪贴着“抗日高于一切”六个大字，室内墙壁上贴满抗日救亡歌曲。无数青年学生立即为之吸引，主动找到合作指导室来，有的打听前线消息，有的要求参加救亡活动，有的要求介绍到延安去。聂之俊对他们总是热情接待，循循善诱，启发他们去认识社会，探索真理。

聂之俊领导合作指导室的同志，以发放农贷、兴办合作事业的名义，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界人士。通过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不仅使各界群众懂得了许多抗日道理，而且象《义勇军进行曲》（今国歌）、《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也在竹溪流行